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寻找红色记忆

红河地下党支部：山沟里的隐秘堡垒

在彭阳的山川间，红河像一条银丝带环绕着一个又一个秀美的村庄。

沿着水泥路盘山而上，经过一段砂石路，就来到了红河地下党支部旧址，这是一个隐秘在山沟梁峁间的地方。当地人说，这里叫做羊尾沟，过去交通闭塞，是个极适合隐蔽的地方，也因此成了红河地下党支部开展革命活动的主要聚集地点。

旧址所在院落坐北向南，共有9孔窑洞，正面5孔，西侧4孔。其中西侧有一孔为高窑子，要借助梯架等辅助工具才能顺利进入，这孔窑洞也是红河地下党支部经常议事的地方。走进院落正面的一孔窑洞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对着窑洞门口的墙面上，挂着一面党旗，右手边是一个土炕，土炕上放着一张小方桌，炕边的土台上摆放着简易油灯、煮茶罐等工具，眼前仿佛浮现，为了革命、为了胜利，红河地下党支部的同志们挑灯夜战、秘密工作的场景。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对贫苦的老百姓秋毫无犯，严明的军纪、亲民的态度，让老百姓从心里认定这就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子弟兵。半年多后，西征红军来到了这里，有了之前的基础，老百姓欢天喜地迎接红军、慰劳红军，军民情同手足。1936年年底，在红军的帮助下，红河抗日救国委员会成立，当地人王兆璜担任主任。之后，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党的活动逐渐活跃起来。

红河地下党支部旧址。

1939年7月，红河抗日救国委员会辖区内已经有中共正式党员15人。为此，中共固原县委决定正式成立红河地下党支部，王兆璜担任党支部书记。并相应成立了野王沟道、杏树湾、野王3个党小组。组长分别为杨武魁、王永清、李耀庭，每组5人。党支部采取分头活动、单线联系的方式，白天不能活动，夜间开展工作，在对敌斗争中取得的成绩卓有成效。

红河地下党支部经常议事的地方在党小组组长杨武魁家里，也就是现在的旧址所在地。由于地处偏僻、隐蔽性好，加上他和儿子杨生春思想进步，诚实厚道，能够保守秘密，他家就成了红河地下党支部活动的主要地点。后来很多地下革命者到红河后，都安排在杨武魁家隐藏，杨武魁不仅免费提供食宿，还为支部活动安全提供保障。

“你看，对面河湾里有一个堡子，那是用来放哨的，一旦有什么敌情，就可以第一时间传递到这里。”站在旧址门口，红河镇红河村纪检委员王靖指着远处一座形状奇特的建筑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还是个孩子，当时王兆璜老人还在世，学校里、村里经常请老人家为我们讲历史，如何秘密开展工作，如何打仗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所辖范围在敌占区，红河地下党支部一直在开展秘密斗争，到解放战争开始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党支部采取了更加积极、灵活、有效的斗争方式，不断吸收思想进步人员，扩大革命阵营，及时准确掌握敌人动向，挫败了敌人很多次有预谋的破坏活动。到1948年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级党组织要求红河地下党支部积极发动群众，壮大队伍力量。到1949年，党支部组建起一支60多人的游击队，由此对敌斗争逐步从地下转为半公开，与当地国民党的政权基本处于对峙状态。

1949年8月，红河党支部走上了崭新的革命和建设历程，这时党支部已有中共正式党员50多人。此后，这一批久经考验的同志都积极参与和负责当地政治和经济建设。

红河地下党支部的成立，从秘密开展工作到队伍不断壮大，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时11年之久。这是一支宁夏农村唯一坚持开展革命活动直到全国解放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斗争史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乐章。

如今，红河流域成了彭阳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设施农业、林果经济、生态建设、流域治理等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也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感受红色历史，回首峥嵘岁月的精神高地，每年建党节或者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县上、镇上、村上都会组织党员到这里听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传承红色精神。

（据固原党史网）

宁夏党史大事记（十五）

邢万莹

1936年9月21日 张国焘动摇执行中共中央制定北进方针，命令红四方面军部队调头西进，致使静会战役丧失战机，推后了三军会师，影响了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

1936年10月初 中央军委多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指出目前的方针是利用时间休整，准备于11月开始执行夺取宁夏的任务，同意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进至靖远、中卫地段准备渡河事宜，其主力在西兰公路静会段滞阻南线敌人北进，掩护红二方面军北上。

1936年10月初 中共三边特委在盐池县成立，张心余（张德生）任书记，旋即由贾拓夫接任。红二十八军协助中共三边特委在当地建立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同时，相机向与盐池、豫旺毗邻的灵武县开展游击战争。

1936年10月11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对夺取宁夏的各项准备和各项任务作了具体部署。

1936年10月13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按《十月份作战纲领》制定宁夏战役计划的纲要。要求纲要在与朱德、张国焘面商后，提请中央军委批准。另外，还指示派一负责人带电台到黄河边，协助红四方面军渡河。

1936年10月23日 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呈报《关于宁夏战役的部署》。同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及第四、第三十军到达打拉池，同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会合。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徐海东等会晤，商讨宁夏战役计划。彭德怀提出宁夏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西方面野战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兵力袭击定远营，相机攻占宁夏省城。

1936年10月24日 中央军委致电红军总部，同意彭德怀23日9时电报之宁夏战役计划。

1936年10月24日 鉴于战局的突变，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宁夏战役计划。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和朱德、张国焘等，指出，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部已经占领西兰大道，如继续北进，“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1936年10月25日 中央军委致电红军总部及三个方面军领导人，对阻击南敌和实施宁夏作战作了全面部署。指出，红军应先击破南敌，再集中向北。并决定先以三个方面军主力进行海打战役，击破南敌，停止敌人追击。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海原、打拉池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同时，为了给下一步向北攻取宁夏创造条件，决定红四方面军以大部分兵力参加海打战役，以两个军西渡黄河，之后转向宁夏中卫、定远营行动。

■宁夏革命英烈■

“硬骨头汉子，了不起的共产党员”——任天才

邢万莹

任天才（1919-1947年），生于宁夏平罗县任家夹道（今石嘴山市西永固乡西永固村六队）。幼年时父母双亡，13岁的任天才和12岁的弟弟任天佑无家可归，只好靠给姓李的地主放羊糊口度日。苛刻吝啬的地主不是克扣兄弟俩的工钱，就是不给饭吃。无奈，兄弟俩只好去给大户董家放羊。苦难的岁月，使他自幼就养成了坚强不屈的性格。1937年7月，马鸿逵要抓董家的儿子当兵。董家用金钱买通保甲长，用“狸猫换太子”的手法，让任天才顶替董家的儿子当了兵。

1940年6月，任天才决心逃脱火坑，东渡黄河去寻找共产党，于是他和同乡李英选避开马鸿逵骑兵团的封锁，跑到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给刘安则家打短工。其间巧遇曾和他一起当过兵后来参加革命的邵文章。

1944年，任天才、李英选经邵文章介绍来到定边，通过支队负责人王茜、王延参加了革命。不久，党组织派任天才去鄂托克旗以放羊、种地为掩护搜集敌情，引导贫苦人和马鸿逵部下的逃兵到定边参加革命。

1945年夏，任天才由王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常年出入敌占区，搜集了国民党二十六师、鄂旗四王爷杨森札布和章文轩所控制的阿拉庙方面的情况，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7年春，马鸿逵配合鄂旗四王爷杨森札布向三段地发动进攻。迫使鄂旗工委撤离三段地，组织决定任天才继续留在三段地搞地下工作。4月中旬，任天才去大庙侦察敌情，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三段地伪办事处处长申计米图和专员韩裕如对任天才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皮鞭抽、木板打、磨盘压、上脑箍、用竹签子钉手等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了严峻考验。敌人毫无所获，借口任天才是逃兵，就将他押送盐池交给马鸿逵部处置。不巧在那里遇见了当兵时的连长余正超（因丢失枪支被捕入狱）。他像疯狗一样咬定任天才就是曾偷走他枪投奔共产党的人。马鸿逵警察处当即将任天才打入死牢。10月，马鸿逵下令对任天才执行枪决。就义前任天才慷慨激昂地告诉胞弟任天佑：“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我死而无怨，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年仅28岁的任天才在宁夏惠农县黄渠桥镇英勇就义，当地群众一致赞扬他是“硬骨头汉子，了不起的共产党员”。

1953年2月6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民政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名义为任天才颁发了烈士证书，将烈士遗骨迁移到大武口武当庙山坡下。每逢清明节，各族人民到烈士陵园扫墓，缅怀任天才烈士的英雄事迹。任天才这个坚守信仰、铁骨铮铮，面对死亡毫不畏惧、大义凛然，令敌人胆寒的宁夏汉子，将永载共和国的史册！

（作者系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专家）

移民岁月 第四十六期 YI MIN SUI YUE

打开华北落叶松进入宁夏大门的人——梅曙光（四）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梅曙光坚持深山育苗的事迹受到过农林科学院的表彰。重要的是，华北落叶松的育苗工作在他的精心努力下取得了成功。从1967年开始，华北落叶松先在泾源县试种，效果很好，随后一发不可收拾，从泾源到西吉、从固原到隆德、从海原到同心，华北落叶松种植范围逐年扩大，这个新的树种也从六盘山走到南华山、从月亮山到贺兰山阿拉善左旗的哈拉乌山沟，从二龙河到火石寨。一路走一路绿，一路走一片林，面积逐年增长、树木郁郁葱葱。讲起逐年增长这件事，梅曙光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梅曙光：华北落叶松在大面积推广时已经到了文革时期，当时苗子育成了，种树找不到人了。在西吉火石寨荒山造林时，按照火石寨公社的统一安排，每天上3个大队的劳力，大概在300人左右，但到了现场一看，我傻眼了，来的劳力全部是老人和小孩，壮劳力很少，来到植树现场的人也是腰来腿不来，一天也种不了几棵树。我跟群众交流时他们说：“参加植树造林不会给劳动报酬，说是给，实际上是骗人的。”我们就要想个办法，我跟会计一商量，第二天就把现金带到山上，收工的时候验收合格的现场领钱，钱不多，一天只有7毛钱。娃娃回去后告诉大人，他们真的发钱，收工就发钱，第三天，来了1500人，全是壮劳力，最多的一天来了3000多人。我问他们今天怎么来那么多人，还没有轮到你们，他们说：“再不来树就种完了，种不上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这样一搞，农民的积极性一下子高涨起来，再不用动员，种树的进度和质量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在六盘山林区，目前华北落叶松成为林区的主打树种，种植面积已达40多万亩，占林区总面积的一半左右，解放初期，六盘山林区的森林覆盖率很低，只有百分之几，1986年覆盖率为46.3%，到去年，已恢复到78.48%，成为西北地区生态良性恢复的成功案例。这也与后来实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正确实施分不开。

梅曙光：在六盘山林区的恢复性增长中，关键作用是领导的正确决策和对科技的认同与支持，老一代林业科技工作者无私奉献与帮助对促进华北落叶松的成功引进的作用不可低估，包括汪愚、戴秀章等很多同志。

正是在林业前辈和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梅曙光在事业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走，每前进一步，身后就留下一片绿色。他说：“人活百岁，树才长成。留下一片树木造福后人。”梅曙光还曾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贺兰山森林景观动态变化及环境的影响”的研究。

据了解，当年与梅曙光一起来宁夏的7名同学现在留在宁夏的只有3人，他说，来宁夏在生活上是吃了些苦，但从来没有后悔过。

梅曙光退休后，仍从事着他喜欢的林业工作，关注的目光由六盘山转到了贺兰山东麓，在他的指导下，在贺兰山东麓种植了总长度30到40公里的防风防沙防护林带。成为银川市防风固沙的一道绿色屏障和景观园。

梅曙光：六盘山林区能很快的完成恢复性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没走弯路，尽管当年杨树上山口号喊得很响，动静也不小，但最后都因无法适宜当地的生存环境而没有大面积推开，现在偶尔还能见到些零星的杨树，也全部老化，几十年的树龄全成“老头树”，根本无法成材，而较早引进的华北落叶松已经长到20米以上，全部成材。

西吉火石寨的一位老人讲，当年梅老师给我们承诺，15年后就可成林，我们不信，现在看，他讲的全是真的。

（蔺银生 王旭阳 整理）

转战农垦四十余年的老军工（一）

柳登旺 口述

口述人简介：柳登旺，汉族，1931年出生，陕西靖边县人，中共党员，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警备三旅八团入伍。参加革命工作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边部队、西北独立第一师和农建一师战士、班长、管理排长，宁夏国营前进农场政治处助理员、党委办公室主任，国营前进第三农场副场长，农建十三师三团生产股长、农五师三十四团副参谋长，前进农场党委书记、场长，1978年至1988年，先后任宁夏农垦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曾先后被选为自治区第四、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自治区第五届政协委员，自治区第六届党委委员。1998年离休。

我是陕西靖边县东坑毛团村人，1946年在边区参军，1956年入党，15岁那年参加陕甘宁边区贺晋年领导的警备三旅八团。解放战争打响后，部队先是为保卫边区和国民党胡宗南、马鸿逵部队打游击，后来随着十九兵团参加解放宁夏的战斗。新中国成立初期又在同心、韦州、下马关一带参与剿匪斗争。

从军垦到农垦

1952年剿匪任务完成后，全国转业有四个师，我们这个部队就彻底转业了。当时三个团建制都在，不打仗了，中央对部队有三条规定：剿匪、学习、生产。转成农业建设师就是开荒种地。由战斗队变成了生产队。部队一路风餐露宿，经过枣园、广武、大坝、宁朔（今青铜峡、永宁），用了7天时间徒步到达金贵。在金贵停留了3个月，帮助当地挖了一条排水沟，随后又转战永宁整修唐徕渠，1952年8月1日正式进驻西大滩。

部队开到前进农场，扎的全是帐篷。开始平田整地、挖沟修渠、建筑房屋。那时，西大滩一片荒凉。29.98万亩土地，没有一条渠沟，没有一块田。到1955年，我们大约开了4万亩荒地。

把全师6007人三个团全部转成开荒种地的队伍。一团改成了前进一场，二团改成了前进二场，三团改成了前进三场。后来由军垦又转为国营农垦，把三个农场合了，分分合合成了今天的模样。

当时的师长王世杰，后来宁夏、甘肃合并一个省后，他是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我在部队当过班长、排长，到农建师当过工长即后勤部门的负责人，相当于现在的供销部部长。之后在农场党委办公室当过主任，后来在前进农场任副场长、场长（兼党委书记）。1978年到农垦局任副局长，1982年任局长。

我们军垦时的部队，底子是陕甘宁边区老八团的、马鸿宾八十一军起义来的、十九兵团调入的，还有宁夏当地保安大队这四部分人组成。到了1955年，两省合并，这里留了1700多人，到甘肃4000多人。因为那时宁夏属于甘肃管，大部分人都调到甘肃建新农场去了。剩下的1700多人，除了前进一二三场之外，又办了暖泉、连湖、巴浪湖农场。1950年建设的灵武农场，也是由我们军垦时派去的一部分人员创办起来的。

我在农垦43年，除了搞农业之外，还办了银川糖厂、西干渠水管处、农垦工程处、沙湖旅游业。如今农垦的变化大了，从起初的前进三个场、平吉堡、黄羊滩、玉泉营、灵武三场（农场、园艺场、林场）7个增加到15个农场。农垦处级单位总共24个，农垦经济在宁夏人民生活中占了一定比重，像食糖、牛奶、啤酒、粮油肉，首府银川人可能体会更深一些。

当年西大滩垦荒种地非常艰苦。田无一寸，地无一亩，就是一个白僵盐碱地。那时候住的是帐篷，睡的是地铺，吃饭在露天，“三捆麦柴一个窝，两土疙瘩一口锅。”刮风下雨，都在外边（指帐篷里）。整整3年，到1955年才把房子盖起来。我那时负责供销，木料都是从青海、兰州买的，没有车拉，都从水上运输。我们曾经坐船跟水上运输的人待了六天六夜。白天在黄河边往下发，晚上才靠岸休息。那时火车从东北只通到兰州。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